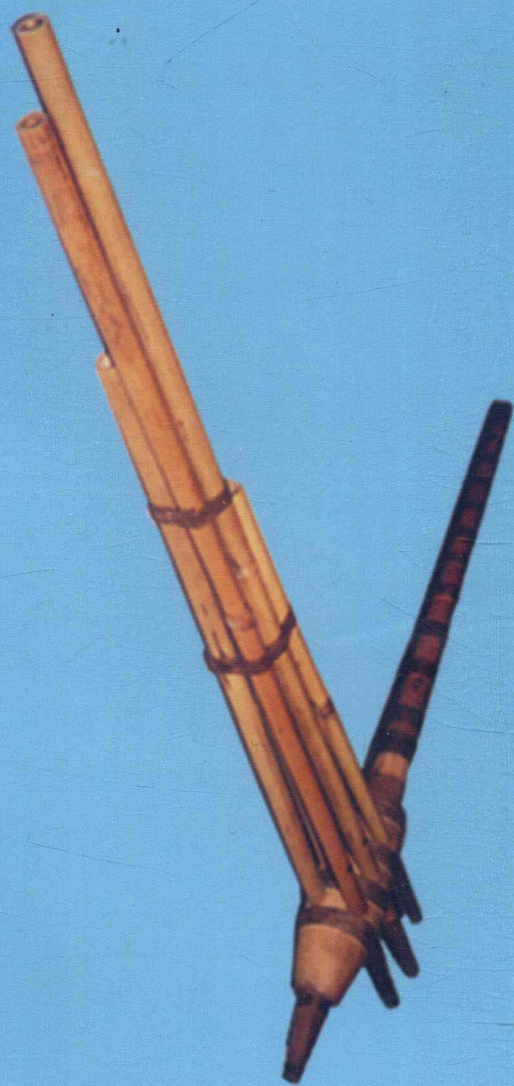


毕节市苗学论文集

贵州省毕节市苗学研究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3)



BIJIESHI MIAOXUE YANJIU
LUNWE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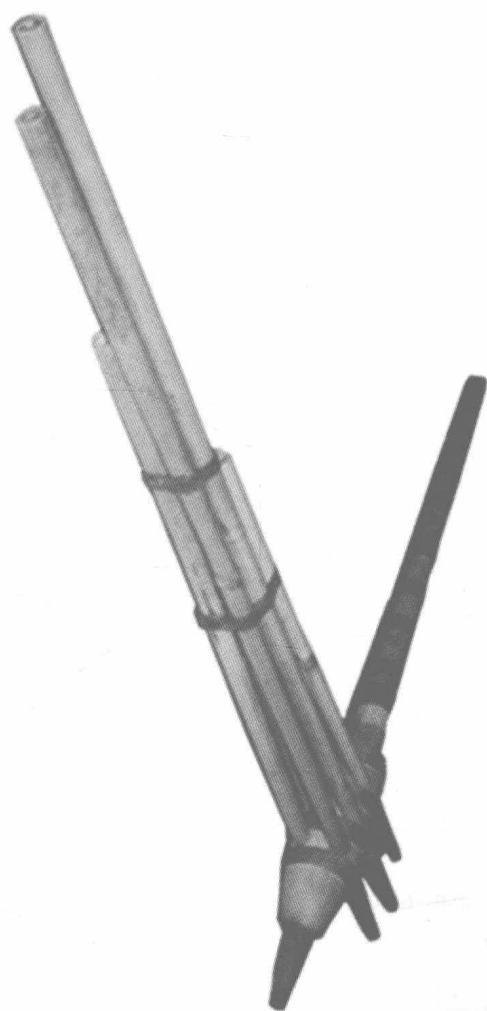
(2013)

毕节市苗学研究论文集

贵州省毕节市苗学研究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3)



BIJIESHI MIAOXUE YANJIU
LUNWENJI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节市苗学研究论文集 / 毕节市苗学研究会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367-6257-2

I. ①毕… II. ①毕… III. ①苗族—民族学—毕节市—
文集 IV. ①K28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8199 号

责任编辑	王时炜
封面设计	何志明
责任校对	刀碧芬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昆明彩邦印务有限公司 (昆明市穿金路 763 号 邮编:650224)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48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1000
定 价	6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6257-2/K·1655

《毕节市苗学研究论文集》(2013)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杨继红

副 主 任：李文汉

委 员：祝德光 祝朝靖 杨国兵 杨官文 侯正邦

王智昌 杨玉书 杨柏桢 王显德 杨忠诚

陈敬书 杨丽萍 朱宇翔 王维阳 陶秀勤

杨银象 罗国锦 杨晓平

主 编：杨继红

执 行 主 编：王维阳

执行副主编：杨银象 罗国锦 杨晓平

目 录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谱写毕节苗学研究的新篇章·····	杨继红 (1)
试论石门坎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李文汉 (9)
西部苗族叙事长诗初探·····	李文汉 (17)
黔西北苗族的宗教文化探究·····	叶章龙 (26)
毕节苗族支系概况·····	祝德光 (36)
陶新春起义总体概述·····	祝德光 (45)
对陶新春起义的系列问题探讨·····	祝德光 (51)
黔西北苗族民间文学翻译史综述·····	王维阳 (59)
黔西北苗族芦笙文化研究评述 ——兼谈苗族支系芦笙文化对比研究的意义·····	付立志 王维阳 (66)
苗族地区生活文化和谐理念研究·····	杨银象 (76)
黔西北苗族祖先崇拜研究 ——以纳雍县4个支系苗族丧葬指路词为例·····	祝 菲 (81)
纳雍箐苗支系族源及服饰特征·····	祝 菲 (89)
试论黔西北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杨晓平 (95)
独特的祭祀蚩尤仪式·····	罗俊钟 (101)
毕节灵峰服饰苗族音乐简介·····	陶兴华 (104)
纳雍苗族飞歌的保护与传承·····	杨永江 李俊美 (109)
对苗族跳花场与吵吵舞保护的思考·····	王文选 (113)
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初探 ——以金沙县苗族乡村为例·····	陶明森 (119)
百里杜鹃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思考·····	陈敬书 (124)
毕节苗族社会经济发展之我见·····	杨吉贵 (131)

毕节苗族古代经济史浅论·····	康丹瀛 (135)
海雀村开发扶贫的实践及理论探究·····	康丹瀛 (145)
黔西北苗族服饰市场化发展探究	
——以海雀村王敏苗族服饰制作为例·····	康丹瀛 (154)
立足实际 全面开发 实现民族村寨经济文化跨越式发展	
——以兴发乡民族和小海子两个典型苗族村为例·····	罗国锦 (164)
海雀发展模式对民族村生态文明家园建设的意义·····	罗国锦 (171)
边远贫困地区苗族经济个案发展初探	
——以赫章县阿髦都大酒店总经理张跃为例·····	杨兴华 (175)
西部苗族文化园项目建设构思·····	熊 勇 (178)
百里杜鹃苗族聚居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与对策·····	陈启敬 (189)
浅议苗族贫困乡镇生态文明家园建设	
以金沙县高坪乡联合移民新村为例·····	王文选 (194)
苗族村寨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	杨道才 (199)
关于苗族干部培养选拔的思考及建议	
——以黔西县为例·····	侯正邦 杨银象 (203)
苗族妇女干部和妇女知识分子成长模式启示	
——以黔西县为例·····	杨朝昕 (208)
贫困地区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研究	
——兼谈苗族双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王维阳 张秀兰 (213)
黔西苗族文化教育浅析·····	李志方 (220)
纳雍县边远山区苗族教育反思	
——以纳雍县维新镇阳光村中寨组为例·····	祝国海 (225)
浅议毕节市农村基础教育公平现状及其应对策略·····	杨兴才 (229)
现代化进程中化屋苗寨苗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杨晓琴 (233)
边远山区苗族学生均衡入学情况研究	
——以大方县猫场镇永久苗寨为例·····	安冰雪 (238)
苗族地区贫困原因调查	
——以黔西县为例·····	杨银象 (243)
七星关区八寨镇劳动村同步小康村建设情况调查·····	杨文江 (248)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谱写毕节苗学研究的新篇章^①

杨继红

摘 要：毕节苗学研究从无到有，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几代人的努力，从单纯的文化表层研究到以语言、教育、历史、民间文学、丧葬礼仪、服饰、芦笙文化单一学科的纵向研究，逐渐向多学科横向交叉研究的领域过渡。通过这些研究成果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人才，在省内苗学研究中有了一定的影响。进入 21 世纪以后，毕节苗学研究，在毕节试验区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也在大踏步前进。当下，毕节苗学研究的任务既要立足于毕节苗族现实社会的各种热点问题，又要加强和外界苗学研究机构的联系，共同搭建打造“西部苗学研究”这块国际苗学交流平台。力求取得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上的突破，并大力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利用，服务于社会。

关键词：毕节苗学 历史回顾 深化研究 搭建平台 交流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毕节市苗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了。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毕节苗学研究新征程的大幕已经拉开，将对毕节苗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十八大精神，总结工作，研究判断形势，理顺思路，明确任务，切实把思想统一起来，把目标统一起来，把行动统一起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谱写毕节苗学研究的新篇章。

我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毕节苗学研究的时代意义

20 年前，随着贵州这个苗族大本营中苗学研究的方兴未艾，毕节地区苗学研究会应运而生。20 年来，在黄绍臣会长强有力的领导下，在国内外各方苗学研究者的参与和努力探索下，毕节的苗学研究在艰难中起步，在前行中发展，在探索中成长，一路走来花香四溢，一路走来满枝硕果，50 万毕节苗族人无不为自己能够拥有苗学会这个平台而振奋。

现在，时光已进入到 21 世纪的第 12 个年头，在毕节苗学研究领导岗位上辛勤工作了 20 年的黄绍臣会长已年过八旬高龄。他多次提出从会长岗位上退出，我们对黄老会长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提出的这一请求，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作者简介：杨继红，苗族，贵州省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原毕节地区政协工委主任、毕节市苗学研究会会长。

① 本文是 2012 年 16 日毕节市苗学会换届上的讲话稿。

我是一个深爱自己民族的人，我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极深厚的感情，我有一颗为自己民族振兴而工作的赤诚之心。2012年6月3日，学会理事（扩大）会议上，大家一致推选我继任会长职务，尽管没有经过正式选举，这几个月来，我一往情深地投入学会工作，按计划完成了以纳雍年会为标志的学会年度工作，并与有关同志积极筹备这次会议，同时理顺了以毕节市直机关苗学会为主的学会内部组织关系，为学会下一步工作的正常开展奠定了基础。

各位代表：我们知道，毕节市苗族是中国西部苗族文化的代表区域之一，其传统文化特征是毕节30多个少数民族中文化最为耀眼的民族之一。进入21世纪的今天，毕节市苗族仍保留有完整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既有传统的文化要素，也有现代文化要素，如民间文学、传统宗教、丧葬习俗、苗语言、服饰、雕花刺绣、蜡染、婚俗、基督教文化等。这个文化体系与作为当代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体系截然不同。民间文学大师燕宝先生曾说过“苗族的文化精髓在民间”，燕宝先生的这个论断不仅为我们指明了毕节苗学今后研究的工作基本思路，也明确了苗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对苗族民间各种文化现象的解读，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深层理解、认识苗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些文化现象解读苗族社会发展滞后的深层根源，从而找到适合毕节苗族社会发展的新路子。因此，毕节市苗学研究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承担着对苗族这种“文化精髓”更深入、更广泛的各项研究任务。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将重点培养以精通母语文化、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毕节苗族本土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同时吸纳省内外高层次的不同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呼吁并真诚欢迎市直党政部门、县乡两级党政部门及其各种专业研究机构中热心于苗学研究的广大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共同搭建毕节苗学这个研究平台，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为促进毕节苗族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理论依据，成为推动毕节苗族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指南针”。

二、毕节苗学研究的历史渊源

（一）早起的毕节苗学研究

毕节地区苗族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今天，苗族仍保留有自己的语言、服饰、宗教、古歌、丧葬习俗等传统风俗习惯，这种艳丽而耀眼的文化魅力，在黔西北民族文化中独树一帜。早在19世纪初叶，一些具有人类学眼光的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注意到毕节这块古老土地上苗族文化的研究价值，如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团牧师塞缪尔·克拉克1911年出版的《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有些章节就提到毕节苗族的一些历史、风俗、民间文学等有关内容。这可以看成是“毕节苗学研究”最早的记录。

19世纪初叶（1905年），基督教循道公会进入威宁石门坎，传教士柏格理等人创制了苗文，毕节苗族开始出现用自己的文字和汉文介绍苗族传统文化、古歌、民间传说及生活小常识等相关知识的书籍，如《苗族原始读本》等。19世纪30年代，石门坎学校为威宁苗族培养了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如朱焕章、杨汉先、王明基、杨荣新等人。石门坎苗族教育取得的成就及影响是这一时期毕节苗族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其中对苗学开始进行系统研究并有所建树的当属杨汉先。杨汉先在大学期间就显露其学术上的功底，是民国时期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毕节苗族本土民族学者，他先后撰写有《苗族述略》《川南八十家苗民人口调查》等数十篇论文和资料。杨汉先是毕节本土苗族老一辈苗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省内外知名的苗学研究学者。

毕节早期苗学研究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与杨汉先同一时期几位具有人类学眼光的英国牧师，如王树德（威廉·哈兹佩斯）、张绍乔等人，他们的工作成就对威宁苗族民间文学资料的收集，为苗族民间文学的传承、研究与保护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再如柏格里的《苗族的故事》《在中国难于进入的角落里》《柏格里在中国》，克拉克的《在中国某种程度上西南部落中》，赫兹佩斯的《石门坎与花苗》等描述了当时滇东北、黔西北苗族的一些社会现实。这些书籍或资料现在已成为研究早期黔西北苗族社会不可多

得的珍贵文献。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 19 世纪 80 年代的毕节苗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毕节苗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毕节苗学的研究由过去零散的个人行为，转而成为政府组织的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人员既有苗族本土学者，又有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研究者。苗族社会历史调查、苗族语言调查、苗族语言文字的创制、苗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等工作成绩显著。

“文革”时期，和其他工作一样，毕节苗族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全国范围内苗学研究重现生机。有关学者对毕节苗族社会调查、语言调查与研究这两个方面的成果显著。苗族社会调查在五六十年代的基础上又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就，主要调查资料收集在《贵州民族调查》《民族志资料汇编·苗族》（第二辑、第五辑）等文献里。代表学者有张济民、吴新建、徐志森、翁家烈、陈天俊、姬安龙等。对苗语的调查与研究是这一时期毕节苗学工作的主要内容。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王辅世均有成果问世。此外王德光、李德芳、谭佛佑、李璧生、罗兴贵、杨勤盛、鲜松奎、张济民等都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这个时期对毕节苗族社会研究的多是省内外高层次的专业研究人员，毕节本土学者研究成果在苗学界影响较大的除早期的杨汉先外，李文汉、李义军等人的研究也有代表性，如历史研究方面李文汉的《黔西北苗族迁徙试探》，民间文学方面李义军的《大方木梳服饰苗族的风俗与口头文学》等等。

三、毕节苗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与影响

（一）毕节苗学会成立后的成就及影响

1992 年 8 月，毕节地区苗学研究会在威宁成立，黄绍臣同志被推选为会长。在黄绍臣会长的领导下，地区苗研究会不间断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会，通过这种交流推动省内外苗学爱好者以毕节苗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毕节苗族政治、经济、传统文化、语言、历史做了较全面的探索研究。地区苗研究会先后整理或参与整理出版了《苗学研究论文集（一）》《苗学研究论文集（二）》《乌蒙苗歌》《石门坎与花苗》《陶氏兄弟与猪拱箐》《毕节市大南山苗族芦笙曲词集》《咸同烽火》《黔西苗族古歌》《刻纸艺术》（苗族彝族风情专集）等作品。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毕节各市县不同支系苗族的历史源流、政治经济、风俗风情、语言、民间文学、音乐、丧葬习俗等内容。有的文章材料厚实，论述全面，有独到的学术观点，如李文汉的《黔西北苗族迁徙试探》，此文获得了毕节地区首届社科类优秀论文奖；有的文章观点有针对性，对解决毕节苗族社会实际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东人达的《教育应办到山寨——黔西北苗族的振兴之路》；有的文章视野开阔，立足毕节的社会大背景，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探索毕节苗族社会发展的现实与前景，如王正义的《改革大潮给黔西北苗族带来的思考》；有的文章理论性强，专业水平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胡家勋的《苗族芦笙文化丛——黔西北苗族芦笙文化研究》等。较多的文章则是关注毕节苗族社会现实的一些热点问题，如教育、经济、干部队伍的培养等。通过这些学者的研究及其文章，初步揭开了毕节苗族社会发展的一些神秘面纱，让外界学者、党政部门对黔西北苗族有了一定的认识 and 了解。为毕节市各县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进入 21 世纪，在地区苗学会的影响和带动下，各市县纷纷成立了各自的苗研究会。2005 年 8 月，织金县苗学会成立。同年 12 月毕节学院大学生苗学研究小组成立。2007 年 6 月威宁县苗学会成立；同年 10 月纳雍县苗学会成立。12 月，大方县苗学会成立。2009 年 10 月，在深入开展“十月民族团结活动月”的高潮中，黔西县苗学会成立。2010 年 9 月，赫章县苗学会成立；同年 10 月，毕节市（七星关区）苗研究会也正式成立。目前全市除金沙县和百里杜鹃管委外，其他各县区都已有了各自的苗研究会。

毕节各市县苗学会成立后,除了开展苗学学术交流外,还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纷纷举办了不同形式和规格的苗族文化节日活动。2008年,纳雍县举行首届“滚山珠”暨神仙坡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节,来自六盘水、毕节地区等地的数万名苗族、彝族、白族、汉族等民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欢聚在一起,在共庆端午佳节的同时,享受了一顿“民族民间文化大餐”。2009年赫章县举办了主题为“观韭菜花海·品苗族风情”的“2009中国·贵州·赫章韭菜花旅游文化节暨大韭菜坪苗族花山节”活动,活动开幕式上,苗族原生态舞蹈演员们为省内外的游客表演了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多次获奖的苗族舞蹈《大迁徙》、苗族精品舞蹈《滚山珠》《矮桩舞》等优秀节目。

2010年贵州省苗学会举办的“2010年学术年会暨西部方言区苗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会”在黔西召开,会议以促进苗族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指向,就西部方言苗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进行了专题研讨。来自云南、四川以及贵州省内各地(州、市、县)的苗学研究专家们就西部方言区苗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和阐述,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2011年贵州省苗学会、毕节地区苗学会学术研讨会在威宁县召开,省苗学会会议议题是“石门坎文化现象与苗族教育”。毕节地区苗学会会议议题是“苗族社会经济发展”。国内关注石门坎文化现象及毕节苗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学者们齐聚威宁草海之滨,共同探讨“石门坎文化现象”,探索毕节苗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省政协主席王正福和副省长蒙启良、刘晓凯为会议发来了贺信。会议组织者还专门组织与会代表到石门坎参观考察。这次会议是继黔西会议后在毕节地区召开的又一次高规格的苗学学术研讨会,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省苗学研究会在毕节的这两次专题会议向外界展示了毕节苗学研究的价值及其意义,同时表明毕节完全有能力承办大型的苗学学术交流活动,大大提升了毕节苗学研究在省内外的影响和知名度。近几年毕节市各县区苗族文化的繁荣及文艺的推广普及,各乡镇苗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高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毕节苗学研究的现实社会价值已深入到毕节试验区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

2010年毕节地区苗学研究会被国家民政部门表彰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二) 有代表的专家及其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在毕节苗学研究的领域里面,涌现出了一批专家及成果,这些专家及成果既有省外的乃至国外的知名专家学者、省内的专业学者,也有我们毕节本土许多默默耕耘的学者。国外学者中影响较大成就突出的是英国的张绍乔、张继乔两兄弟,此两位学者早年在石门坎工作过,精通威宁苗语苗文,对苗族文化有较深的认识,1949年返回英国后,两人的后半生全身心投入到石门坎苗族文化的研究里面,先后取得以下几项成果:一是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计算机专家Mr Best·Bake的帮助下,开发出了老苗文的电子字库及录入软件,目前这些技术已普遍应用于相关领域和滇东北苗族社会;二是编撰整理成苗、英文对照的苗族传统文化资料集共四集,第一集《起源》、第二集《苗族历史》、第三集为《社会生活》、第四集为《叙事故事》,此四部资料集2007年由我区有关部门正式翻译出版,既《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苗、英、汉对照,上下卷),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三是编撰成苗、英文对照的Hua Miao-English Glossary《花苗词汇集》(上、中、下册)。国外苗学研究者中,瑞典学者Joakim Enwall 阎幽罄先生的研究也较具有代表性,他的博士论文《神话成为现实的历史与发展——苗族的语言文字》从社会学的角度,引用大量国内外少见的资料对滇东北苗文的历史发展、国内几种苗文的运用及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对比论述。其研究视角新颖、资料翔实,有独到的观点。

30多年来,对石门坎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苗学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中首先对石门坎文化深入研究并有建树和影响力的学者是张坦,他于1992年出版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个人专著,记述了基督教传入滇黔川边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的始末,再现了曾经被誉为“苗族救星”的传教士柏格理的事迹和被誉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的石门坎当年的盛况。此书的出版,掀起了国内学者对石门坎文化研究的热潮。2003年,东人达教授及其女儿东旻译注的《在未知的中国》,全书70余万字。《在未知的中国》是在全国人大代表杨汉先(苗族)、安毅夫(彝族)、李学

高(苗族)等先生的倡议和鼓励下完成的,收录有柏格理、邵慕廉、王树德、甘铎理、张绍乔、张继乔等人的著作。作者均为英籍来华传教、办学的当事人。书中记录真实,比较客观地勾画出近现代南方各民族社会概况、基督教循道公会在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整个历史过程,及由此引发的苗族、彝族、汉族、傈僳族等民族教育与社会改革运动。这些文献被苗学学者认为是研究苗族历史的“失而复得的无价之宝”。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民族研究方面的一项资料空白。2003年东人达教授再次出版他的个人研究专著《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0年第二批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重要科研成果之一,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与重庆三峡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科研项目。这本40万字的专著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归纳滇黔川边的民族教育,发掘出许多以往鲜为人知的史实。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总结宗教与教育运动产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原因,石门坎是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对石门坎文化研究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沈红研究员,她的第一部专著《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是她在2001~2004年寒来暑往,深入威宁自治县石门坎乡进行田野调查的产物。她通过调查和访问了许多见证石坎文化变迁的人士,让现实的人们得以遥望石门坎百年风云,观察那些曾经的辉煌,进而引发人们对石门坎“百年兴衰”的思考。沈红的第二部专著《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于2007年出版,作者认为:石门坎苗民从一个最贫困的族群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先锋”,具有另类发展经验。石门坎文化变迁是特定的结构运动过程,新的结构发生机制是在主体与客体对立的结构关系中获得启蒙的。石门坎文化系统直接参与了苗民主体性建构。这个山村文化结构的发展动力以及结构坍塌的原因,可从贫困苗民处于结构与主体关系的历史坐标上找到。

在对石门坎文化研究的热潮中,除学术专著外,还出现了一批以柏格理等人及故事为素材的文学作品,如杨大德的被认为是“冲破禁区”的长篇小说《中国石门坎》,阿信的《用生命爱中国——伯格理的故事》,王大卫的《追赶生命》《寻找天堂》《天地无极》《中国石门》和《寻找那些灵魂》等等。2011年中央电视台以《寻找那些灵魂》为蓝本,摄制了3集纪录片《在天那边》,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

在毕节本土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对清末震撼黔西北、滇东北、川南区域范围内的陶新春、陶三春起义的研究,成果也颇丰,代表研究作品有3部,分别是《咸同烽火》《陶氏兄弟与猪拱箐》《陶新春起义与黔西北苗族》,这3部作品不仅收录了地方志书上有关陶新春起义的史料,对同时期的作品也逐一收录其中,如1988年贺国鉴的《猪拱箐苗族起义综述》等,这些作品为下一步深入研究陶新春起义的历史意义做了很好的铺垫。

30多年来,本土学者中,对黔西北苗学研究颇有影响并有建树的是彝族学者苏晓星先生,他的苗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苗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上,其成果都收入了他的专著《苗族文学史》里。1988年10月,在苏晓星的努力下,在毕节地区和赫章县的资助下,经贵州省委宣传部批准,来自全国各地的苗族各方言土语的100多名学者云集赫章,成功举办了为期5天的全国苗族文学史座谈会,此次会议不管是对全国苗族文学来说,还是对毕节地区苗学研究发展历史来说,都是一件深远的、有纪念意义的大事。此一时期对毕节地区苗族民间文学收集整理做出贡献的还有苗青教授,他先后组织编写了毕节地区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苗汉文对照的苗族民间文学作品《西部苗族民间文学作品选(一)·(二)》。

在这30多年中,王正义是毕节地区学者型领导干部的代表,他曾在省、地有关报纸、期刊及杂志上发表理论文章数十篇,散文30余篇,散文集《我的故乡月》于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苗学研究也颇有建树,他曾主编过《赫章苗族志》,发表有《黔西北苗族与蚩尤》《赫章苗族脱贫致富初探》《黔西北苗族的寨老》等苗学研究论文,这些文章多数收集在《赫章苗族文集》里。胡家勋教授是毕节汉族本土学者对黔西北苗学研究中较有影响的专家之一,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黔西北苗族各支系的音乐。他主编过《乌蒙苗歌——黔西北苗族民间歌曲集》,发表有《黔西北苗族芦笙文化丛》《黔西北苗族芦笙语现象探析》等具有较高理论深度的专题研究论文。其中《黔西北苗族芦笙语现象探析》在《音乐研究》杂志上发表后,又被译成英文转载于美国MUSIC IN CHINA音乐理论刊物上。在他的影响和带

动下,目前毕节学院音乐系的不少师生开始致力于丰富多彩、具有原生态价值的黔西北苗族音乐的研究上来。杨忠信是威宁苗族苗学研究的代表,他关注威宁苗族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对石门坎文化的资料收集较齐全,撰写有《威宁县苗族教育百年发展概述》《石门坎百年的沧桑》等专题文章,参与《威宁县志》《威宁民族志》《苗汉词典》等多种大型书籍的编写及校对工作。在威宁苗族民间文学的收集、翻译、整理出版工作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威宁苗学研究的本土学者中,李文渊值得一提,他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致力于威宁苗族历史的研究,历经几十年,编撰有《威宁苗族简史》手稿(未出版),撰写有《劳浸靡莫·西系苗族和滇王国试探》《关于仡佬族古代问题》等几篇颇有影响力的地方历史专题论文。大方苗学研究中项兴荣的成果较具有代表性,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大方六寨苗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上,成果作品有《六寨苗族口碑文化》《六寨苗族》《苗族芦笙辞》等,苗青主编的《西部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二)》也收录了其部分作品。杨银象当属黔西县苗学研究中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涉及黔西苗学的方方面面,他熟悉苗族古歌语辞、曲调,《黔西苗族古歌》是其代表作品。纳雍县的祝菲是毕节本土苗学研究者中的唯一女性,她的成果不是很多,但研究的视野开阔,选题有代表性,论文撰写规范,有的文章涉及彝学方面的内容。如《浅析纳雍小花苗族服饰》等已显其学术功底。

30多年来,一批中青年苗族本土学者逐步成长起来,杨永光、王维阳、康丹赢、罗国锦等已具备了苗学研究的基本学术功底,有的学术成就已凸显于本地或其他相关的苗学研究领域。如王维阳的《苗语理论基础》和由他组织整理、翻译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先后于2007年2009年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三等奖。近年来,毕节本土年轻一代的苗学研究者中,大方县的杨晓平,毕节学院的陶兴华、王旭东,纳雍县的杨永江,赫章县的朱建平,威宁县的杨道才等也具备了从事苗学研究的基本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毕节地区政协工委,毕节学院中文系、教育系、艺术系,毕节地区民族研究所,各县民委都对毕节苗族的历史文化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毕节地区政协工委组织编写(叶章龙主编)的大型文史资料《毕节地区苗族百年实录》就很有代表性。通过这些学者和部门的共同努力,黔西北苗学研究及其研究意义越来越引起省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关注。

(三) 毕节市苗学研究中的问题

回顾毕节苗学研究走过的历程,毕节苗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存在几个问题。其一是研究力量不足,专业的研究队伍缺乏,整体上的研究成果较为业余,质量不高,影响不广。毕节苗学研究取得的这些成果中,公开出版的、学术价值高的、在苗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多数仍为省内外高层次的专业学者,如王辅世、鲜松奎的苗语研究,沈红的石门坎文化现象研究,东人达的川滇黔基督教文化研究等;毕节本土学者的研究整体上都还很业余,多数成果都是未公开或半公开的内部资料,还属于资料收集阶段,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其二是研究方向不太明,研究中对现实的苗族社会各种现象如教育、经济、人才培养等缺乏深层次的思考,盲目性或功利性的研究内容较多,这对苗族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意义不大。其三是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缺乏对苗族历史及其各种文化现象横向和纵向对比研究的内容。这三个问题是目前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加以切实解决的问题。

当然,也要看到我们毕节本土学者的自身优势,这就是天时地利,我们各县区都拥有丰富的苗学研究资源,这些资源有的是现成的,如各县区收集的民间文学文化资料;有的是存在于民间的,如服饰文化、节日节气文化、丧葬礼仪文化等。其次,毕节本土学者都熟悉苗语,对毕节苗族母语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不管是老一代的杨汉先,已辞世的王正义、项兴荣,在职的李文汉、杨银象,还是年轻一代中的王维阳、杨晓平、康丹赢、罗国锦等都是苗族母语——苗语的精通者。精通苗语语言,就拥有了进入毕节苗学领域遨游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外界学者很难拿到手,他们在对毕节苗学研究的过程中,许多观点、学术立场都是依靠汉文资料的描述开展的,因而研究结论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望文生义之疑,自然对毕节苗学很多精髓的东西难以深入。所以,毕节的苗学研究者,要较好地会利用自身的优势,以

此弥补理论阐述上的欠缺,充分发挥我们的天时地利,用好“熟悉苗语”的这把钥匙,提高我们苗学研究的深度,增添我们学术成果的厚度,进而提升我们苗学研究成果的含金量。

学会是一个沟通信息的平台,是一个交流思想的平台,要搭建好这个平台,需要我们广大的苗学研究者投入更多精力,拿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才能让这个平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实在在地为毕节各级党委、政府提供各种解决苗族社会问题的理论依据,为毕节民族文化建设添砖加瓦,才能真正体现苗学的价值。

四、毕节市苗学研究面临的形势及任务

(一) 对毕节苗族社会发展普遍滞后于其他兄弟民族的社会现实,要有深刻认识,高度关注

毕节苗族先民迁入毕节的历史很复杂,从一些零星的汉文史料、彝族古籍以及苗族的口碑传说等推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苗族迁入毕节定居,如赫章苗族(小花苗)支系;晚一些的其他支系也在清朝初年就进入毕节,如六寨苗族支系、素苗支系等。历史上毕节苗族先民由于战乱所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同时期先后进入毕节的各支系苗族都始终处于不断迁徙求生存的境地,进入毕节后,又多居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林野地,多数依靠打猎为生。政治地位上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底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苗族人民政治上摆脱了压迫,经济上挣脱了奴役。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一部分有开拓进取精神的苗族,率先放弃传统耕作方式,经过了艰苦创业和积极探索,出现了金沙湖水乡杨明生的“以短养中,以中保长”的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达到了生态平衡、粮食增产、经济增收的效果。此外,苗族地区还出现了不少带头致富的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相比,生产力综合水平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进入21世纪以来,毕节各地苗族村寨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不少苗寨已告别传统的茅草房,有的已进入到黔西北民居的房屋改造行列。有的地方如大方县、织金县、赫章县、七星关区等甚至出现了拥有上百万乃至上千万资产的苗族企业家。文化上,威宁石门坎文化、苗族飞歌,纳雍“滚山珠”芦笙舞,黔西化屋多声部合唱,赫章的大迁徙舞,织金洞周边的苗族文化村寨旅游,毕节大南山苗寨等,都已经是享誉省内外的毕节试验区民族文化品牌。

但整体上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毕节苗族多数都居住在土地贫瘠的山区,自然条件较差,教育发展滞后,由于人口素质低下,与其他兄弟民族相比,毕节苗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发展普遍滞后于其他兄弟民族。进入21世纪以来毕节苗族社会发展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横向上看,教育、经济等方面普遍滞后于其他兄弟民族;二是纵向上看,苗族内部发展也很不平衡,七星关、织金、大方、纳雍、赫章等县区已出现了一些苗族企业家,但数量很少,还未形成规模,同时,有的县连个体户都还很少,而农村苗族社会生产仍以务农或半农半工(指季节性外出打工)的生产方式为主;同一乡镇的苗族,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村寨与沿公路线的村寨发展差别也较大。干部队伍建设上随着一批老干部的纷纷离退休,苗族副县级以上的年轻干部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由于整体的文化素质都普遍较低,在金融、邮电、医疗、水利、毕节学院等专业层次较高的部门或领域里也缺乏高技术专业人才。

要实现毕节苗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仍然是我们广大的苗族干部、苗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希望各位会员代表从思想上、认识上对这一现实问题高度关注,在毕节各县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并身体力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课题的研究上,推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句话,苗家的事情做好了,我们就为毕节试验区做出了贡献,为推动贵州西部发展相对滞后族群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国家西部大开发做出了贡献。

（二）现实的任务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各位代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苗族社会发展滞后的现实是数千年的历史造成的，苗族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的武力征服和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压迫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历史上始终都处于政治和经济的边缘，这个民族的生存观、价值观是不同于其他兄弟民族的。对待苗族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民族的发展模式来看待或研究这个民族的各种问题。研究苗族现实的经济及其他社会问题，如果忽视历史问题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就会变得狭隘而苍白，难以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相反如果只关注历史的研究而忽视现实各种热点问题，我们的研究同样是有意义而无价值，作用也不大。因此，我们在毕节苗学研究的方向上，既要关注历史问题的研究，更要注重现实各种热点问题的研究。方法上，对每一个问题，我们都要用辩证法的理论、观点，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对比分析，理论要联系实际，实践要依靠理论，这样我们的苗学研究工作才会既有意义，才会有价值，才会解决实际问题。

苗学研究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我们要用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毕节苗族支系繁多，文化积淀厚重，与贵州安顺、水城等地苗族，与云南、四川以及东南亚、欧美等国的苗族同属于苗语西部方言区，近年来国外苗学研究者们也很关注毕节苗族社会的发展。毕节苗学研究的任务既要立足于毕节苗族现实社会的各种热点问题，又要加强和外界苗学研究机构的联系，共同搭建打造“西部苗学研究”这块国际苗学交流平台。为此，各县区苗学会要继续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费大功夫，以大手笔投入更多精力和智慧，深入持久地、坚持不懈地就苗族经济发展、苗族教育振兴、苗族文化繁荣、苗族村寨建设等各种问题，按照最紧迫、最急需的现实需要，广泛动员，认真组织，以学会为平台，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循序渐进而不是急于求成地从中选取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取得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上的突破，并大力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利用，服务于社会。

今年纳雍苗学年会上，我们对苗族文化产业开发的研讨做了一次尝试，首先组织参会代表实地考察学习纳雍县很有特色的苗族刺绣厂，随后参观了纳雍县精心准备的苗族工艺商品展，晚上观看了一台极具纳雍苗族特色、高水平的苗族歌舞表演，学术交流中各县代表围绕本次年会确定的主题，作了精彩发言。参会者取得了学习交流、资源共享的双丰收。这样有实效的研讨会为今后我们的苗学研究活动提供了一个样板，这就是：我们今后的苗学研究工作要有较强的目的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在这次会议上，我在发言中就苗学会今后的工作打算，提到了市苗学会将在条件成熟时择机召开苗族乡镇领导干部和苗族企业家两个座谈会。近段时间，我一直在为开好这两个会议进行思考并征求意见。我现在的基本考虑是：市苗学会常规的学术活动每年一次，轮流坐庄，除各县区承办的常规苗学学术年会外，我们每年还要有针对性地选取苗族经济社会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学会论坛的形式，经过精心策划，认真准备，不定期举办不同内容的论坛，以期扩大影响，引起重视，推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我知道要做好这件事，要求严，难度大，风险高。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统一认识，齐心协力，知难而进，我们就会有希望！

各位代表：研究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责任，热爱自己的民族是生命使然。毕节正处在一个加速发展、加快转型、后发赶超的历史时期，毕节的苗族不能再贫困、再落后了。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顺应国家科学发展的大势，顺应苗族思发展、盼发展、求发展的愿望，在毕节苗学研究会这个自己的园地上挥汗耕耘，勤勉工作，通过促进苗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加快毕节试验区各项事业的建设进程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试论石门坎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李文汉

摘要：一直以来，威宁石门坎是中外学者研究毕节苗族文化的主要热点文化之一，石门坎文化现象的形成及影响，除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外，还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苗族社会封闭的社会现实等因素有关。此外苗族自身寻求发展、探索进步的积极动力是这场运动步入“高潮”的原动力。这场文化运动是一场苗族传统文化、中国主流文化（汉文化）、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苗族人及其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探讨它对于进一步了解苗族的历史文化渊源，了解石门坎民族教育取得的成就，对于振兴民族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石门坎 苗族 传统文化 选择 发展

19世纪30年代中期，王建明先生大胆地提出石门坎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①。何谓石门坎？那是贵州省威宁自治县与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接壤的一个苗族村寨。自1905年基督教循道公会从昭通传入，柏格理游说土目安荣之赠予地块后。在偏僻的石门坎这一小山村上，传教士修建了教堂、创办学校、兴办教育。不断向贵州、云南、四川发展，从而使石门坎名噪一时。“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这个命题的提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探讨它对于进一步了解苗族的历史文化渊源，了解石门坎曾经一度辉煌的民族教育，对于唤起苗族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振兴民族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石门坎地处滇、黔、川交界交通商贸要冲

石门坎地处滇东北、黔西北腹地，是山相连、水同源、民同俗、经济社会同类型的地方。明朝以来这片区域长期分别由四川、云南行省统辖。滇东北处于乌蒙山与四川盆地的接合部，它是由川南通向云南昭通的重要通道。黔西北位于乌蒙山向黔中山原丘陵过渡的倾斜地带，以七星关河以西隶属威宁县。乌蒙山地形北低南高，地质构造复杂，褶皱断裂交错发育，喀斯特地貌形态多样，石漠化随着开垦开发日益严峻，该区在历史上自然条件差，气候变化多端，环境十分恶劣，故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奔腾的金沙江把大凉山和五莲峰拦腰切割，境内磅礴的山脉深邃谷底流淌着牛栏江、底拉河、洛泽河等。石门坎东西两侧耸立和横亘着乌蒙山和五莲峰。此域山高岩陡谷深，江河沟壑纵横。另一方面，连绵的山系台地缓坡较多，立体气候十分显著，山脊上自然和生物资源极其丰富。但是，突起于川黔滇边界犬牙交错的山脉呈现的特殊自然地理导致长期以来交通闭塞，人流物流不畅，经济社会发展极为滞后。时至今日，这里是中国版图上还属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的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作者简介：李文汉，苗族，毕节市政协秘书长。

^①《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第249页。

历史上这里是一条重要的走廊。早在先秦时期,乌蒙山就有远古人类居住,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卓绝的劳动和耕耘。从发掘出的文物看,威宁县吴家大坪、赫章可乐、毕节青场和鲁甸县野石大型村落、昭通北闸、鲁甸马厂等新石器遗址充分说明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乌蒙山的河谷和平地地带。可是,由于地域宽广,地形地貌复杂,人类居住稀疏,活动范围局限和生产工具极其落后,人类很难拓展交往和活动的空间。随着对考古发掘和历史资料的研读,可以毫无辩驳的事实告知人们乌蒙山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僰人是最早居住在这条南北走廊的古老民族。“秦、汉之时,在滇、黔与四川南部交界的牛栏江、横江以及横江支流洛泽河(即俗称的戈魁河)一带,洛泽河上游称为佬河,还居住着氏羌族的另一支系——僰族”^①。他们在牛栏江、横江流域的河谷、岩洞中栖息。汉族从川南移入之后,在长期的接触和生产生活中有的融入了汉族,有的向外迁徙。黔西北威宁县野鸡河、赫章可乐、辅处以及昭通城的“梁堆”汉墓群出土文物,无疑说明这些遗址和墓葬是汉代滇人、邛人、昆明、夷人、濮人、汉人的历史遗址。盐津县豆沙关及珙县、兴文、高县和筠连县,还保留着被称作悬棺葬的“僰人子”或“白人子”“白儿子”的祖坟^②。《兴文县志》载:“县属在明以前有都掌蛮,即僰、羿、苗、保,所谓泸夷也。”在乌蒙山区繁衍生息的各民族先民为开发乌蒙山区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居住在乌蒙山区人口较多的苗族先民,他们是经过战争失利之后被迫迁徙进入的。过去我们认为苗族先民是在唐末宋初进入黔西北,有的学者提出苗族先民进入黔西北和滇东北比较早,因为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就有苗族出现在云南省文山州^③。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云南省文山州的苗族是由四川南部迁入滇东北和黔西北后才逐步移往那里的,他们同属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次方言,他们的服饰为同一款式,民间还存在交往和信物往来。

乌蒙山区的苗族先民是多路推进,先后进入。操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先到了乌撒,在战争的影响和繁重夫役的盘剥下,数百年间便分散居住在山腰,在今威宁西北部的洛泽河、底拉河形成两个聚居区。川南的苗族从明代前就不断向毗邻的威信、镇雄、彝良、毕节迁入。故《明世宗嘉靖实录》卷9记载:“正德十六年十二月辛丑……命都指挥何卿提督四川叙、泸、坝底及贵州迤西等处守备,于永宁(今叙永)驻扎。原因是巡按贵州御史胡琼奏:芒部、毋响(均在今镇雄县)等寨苗数越后箐等处烧劫,道路不通,乞行区处……”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说:“苗人,其在滇省者,惟曲靖、东川、昭通等府花苗,随各土流兼辖。其人喜居水滨,耐寒暑。男子青布裹头,短衣跣足勤耕作。”所记的是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昭通府志稿》载:“苗子,花苗、白苗二种,每附岩结庐,依山凿田……”记叙了居住在乌蒙山腹地的两种服饰苗族。这部分苗族是基督教传入石门坎之后,受其影响较深的民族,也是教会学校所辐射到的地方。

早在明朝前苗族就居住在乌蒙山腹地,由于迁入的时间较晚,很多适宜居住的地方已被彝族、汉族居住并开垦,彝族内部阶级分化后逐渐形成土司制度,苗族只能依附于土司统治,从事夫役,交租纳税,过着半猎半农生活,成为土司的奴隶。至此,乌蒙山区就成为汉族、彝族、苗族杂居的格局。从川南经云南的水富、盐津、彝良,从贵州毕节经云南镇雄到滇东北重镇昭通都有古驿道穿山过河经过石门坎。石门坎成为通往周边的要冲。鉴于交通、用水、用煤的便利,英籍传教士柏格理进入威宁苗族村寨考察了几个地方之后,争得土目安荣之的同意,在石门坎修教堂,建学校,经10多年的苦心经营,1922年,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苗疆部教育委员“以苗教苗”的教案逐渐形成。

① 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上集),第243页,民族出版社,1990年。

② 阮荣春、罗二虎主编:《古代巴蜀文化探秘》,第194页,辽宁美术出版社,2009年。

③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少数民族》,第17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二、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苗族社会发育程度低

秦修五尺道进入乌蒙山区,汉族经济和文化陆续进入这里。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表明,汉以前乌蒙山地区气候比现在温暖和湿润,“四川乌蒙军民府(今云南昭通)产茶、筇竹、荔枝、姜、鹦鹉”^①。河谷的冲积坝子土壤肥沃,良好的生态蓄存着丰富的水资源,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灌溉便利,这一带的稻作经济极为发达。威宁县中水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碳化水稻标本,它是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旱稻农业遗存。旱稻农作物的种植,表明当时在这条河谷坝子已经出现了密集的村落,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耕作技术。《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甍名千顷池。又有龙泉以灌溉种稻。”其时僰人居住的朱提郡在东晋前后是重要的粮仓。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为当时居住的僰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滇东北地区较早地接受了汉文化,文化教育独树一帜。《华阳国志》载:朱提郡“其民好学”,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朱提郡虽属宁州治辖,可见其文化却比宁州发达得多。

与此不同的是:苗族先民进入乌蒙山区后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居住在土司的领地里,其社会地位极度低下,由于语言交往有障碍,风俗习惯不同,他们从此处在封闭狭窄的生活环境中,从元朝后期封建统治者多次向乌蒙山土司用兵,严重打击了地方势力,也把苗族捆绑在战争中,加重了苗族的负担,使其生活更加举步维艰,他们弃家往外频繁迁徙。根据口碑资料,居住在威宁县雨科的苗族顺着洛泽河打猎到簸以一带,认为此处好打猎、适宜放牧,便举家搬到簸以居住,至今已25代。彝良县洛泽河镇青树林王姓老人自叙,其祖先从威宁马踏顺祖基河而下,渡过洛泽河居住在彝良县龙街乡王家坪子,后又迁居磨脚、青树林等地,至今已24代^②。这种迁徙是生活所迫顺河而下,居住地较多,说明生活极其不稳定,成了居无定所的流民。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傅友德南征,遣郭英、胡海洋从川南率兵五万“趋乌撒,大兴屯田”,受到战事的骚扰和苛捐杂税的压榨,威宁部分苗族迁入彝良县奎香、寸田坝等地。清康熙年间,威宁、彝良县的部分苗族迁居昭通靖安、五星村、大关口、五堆石、盘河乡大花村,永善县大坪子、南门官寨、老母坟,鲁甸龙树白岩脚和小箐脚^③。赫章县海雀苗族最早是住在威宁的勒格寨,后迁九区安乐河、长寿寨,又迁到彝良县大石庄,再到镇雄县的小米地,最后定居在海雀的^④。种种迁徙最终还是依附于彝族土司、土目。县内的移动同样频繁。从威宁苗族的两个重要的聚居区原大街区和龙街区分析,县外和县内居住的苗族都是由两处聚居区迁去的。从血缘姻亲和亲戚关系有很可靠的依据,从地名与地名分析,虽有一定的转音,但能印证问题。如石门坎苗语称谓为“卯丽那”,它同羊街、大街交会的“丽阿那”有源流关系,可推测石门坎(卯丽那)的苗族是从兴隆厂河搬去的。

这种迁徙实为逃避黑暗的现实和残酷的社会,然而,又使苗族放弃原来的居住地退避到条件更为恶劣的边远高寒山区,过着狩猎、刀耕火种和半牧半农的生活。没有土地、山林、草场的苗族,失去了立足之地,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过着“上山打猎、见者有份”的日子,内部阶级分化十分缓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未形成等级区分。与这种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是:政治上没有形成本民族上层代表,仍然依靠苗族社会形成的寨老制,负责用习惯法管理村寨的事务和处理纠纷,协调对外的关系,这就很难形成在更高层面上统辖苗族重大事务的代表。苗族进入彝区以后,彝族上层以则溪制度赐予苗族“祔写”“祔初”,在村寨中负责行军和行政组织职责。之后又在苗族村寨内部设定“卢色”

① 《图书集·方輿汇编·职方典》卷645《乌蒙军民府·物产志》引《总志》。

② 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编:《昭通少数民族志》,第2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

③ 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编:《昭通少数民族志》,第2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

④ 《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页,民族出版社,2009年。